

伍修权与王稼祥半个世纪的革命友谊

伍修权与王稼祥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1925年,伍修权与王稼祥等同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两人又长期共事、并肩战斗,前后近半个世纪,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同赴莫斯科留学

1925年10月,一批中国青年奔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途中,伍修权与王稼祥同船、同车,一起度过了这次漫长的留学旅程。那时王稼祥才19岁,但已颇有学识,给17岁的伍修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1月22日,伍修权和王稼祥等到达莫斯科时,中山大学已派人到车站迎接这批中国留学生了。

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有语言课、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课、历史课,以及中国问题、经济地理等课程。学生分班是根据每个人掌握外语情况来确定的。入学后不久,中山大学学生编为11个班。

王稼祥因为英语基础较好,同张闻天、沈泽民、俞秀松等被编入第8班(翻译班),直接听外语讲课。他们既当学员,又当翻译员。

勤奋好学的王稼祥,让伍修权非常敬佩,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习课程,并互相鼓励,因此结成了一对几十年交往不断、友情日深的革命战友。

伍修权后来回忆说:“在中山大学期间,稼祥同志留给我的印象既是一个勤勉的学生,又具有学者的稳健风度。”“在学习上,稼祥同志给了我不少的帮助。”

见证“遵义会议关键的一票”

1931年6月,伍修权由苏联回到祖国。这个时候,王稼祥和张闻天等人已先于伍修权回到国内。

到达瑞金后,伍修权被分配到正在筹建的红军学校工作。这段时间里,伍修权与王稼祥虽无直接的工作关系,但能够经常见到面。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中央决定调伍修权去为他做翻译。从这个时候开始,伍修权与王稼祥的接触机会又多了起来。

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情况时,伍修权动情地说:“我们当时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专门为李德修建的一处单独的房子)来,我们拿到电报后首先把它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李德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周恩来和王稼祥。”“当时中央苏区正在开展第五次反‘围剿’,稼祥同志又是军委副主席,各种重要的军事会议都要参加。对李德的错误指挥,稼祥同志逐渐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1934年10月10日长征开始后,王稼祥因伤病坐担架随队行动。进入湘南以后,毛泽东开始对王稼祥、张闻天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伍修

权回忆:“王稼祥同志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和他们一一交换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聂荣臻同志因脚伤坐担架,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同王稼祥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也毫不犹豫地支持王稼祥同志的意见。正是在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遵义会议才得以召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改组了党和红军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伍修权在回忆录里对王稼祥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说:“王稼祥为遵义会议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外交部和中联部的搭档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被任命为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随后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随后也来到外交部就任苏联东欧司司长,两人又在一起工作了。

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访苏。王稼祥为中苏两国领袖和政府间的会谈,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得以顺利签订。在这期间,伍修权也随同周恩来来到莫斯科,他一面在代表团内部协助周恩来,一面常到大使馆去,接受王稼祥交付完成的一些具体事务。

1950年2月间,中苏谈判基本结束,但拟定、校对条约、协定的文本与译文审核和定稿等具体工作都是十分艰巨、复杂、细致而繁琐的事。伍修权评价说:“当时稼祥同志亲自出马,指导、帮助各方面同心协力顺利完成文件定稿工作,而且他在这个场合表现出来的细致、耐心和顽强精神,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感动与敬佩。”

1951年初,王稼祥由苏联回国,不久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联部)部长。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中联部的对外联络工作成绩卓著。1955年5月,伍修权出任我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

同王稼祥还保持着经常的工作联系。1956年9月,伍修权回国同王稼祥一起参加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同王稼祥一起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中联部组建时配备的三位副部长先后调离。为了加强中联部建设,由王稼祥提议、经中央同意,正式调伍修权到中联部工作,担任副部长。对此,伍修权饱含感情地说:“1958年5月,我由南斯拉夫回国,由于一些原因受到批评。正在这时,王稼祥同志极力推荐我到主持的中联部去工作。中联部的工作主要是同外国兄弟党打交道。王稼祥同志考虑到我是中央委员,与外国兄弟党交往时具有一定身份,同时我从事外交工作多年,对这一工作比较熟悉,也能胜任。长期以来他也对我比较了解。在我刚受了批评,思想上有负担时,他建议我到他那儿去工作,不仅表示了他对我的信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他的态度。”

从1958年到1966年,伍修权在中联部工作了整整八年,也是同王稼祥直接合作最长的一段时间。其间,伍修权和王稼祥工作得很有秩序,同志之间的关系也十分融洽,王稼祥还同伍修权一起出席了几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

非常时期,王稼祥遭到诬陷和迫害。伍修权利用仅有的一点权力和影响,在部里一次干部会议上介绍了王稼祥的历史功绩。哪知却遭到报复。很快,伍修权就作为王稼祥的“同案犯”被关了起来。

在伍修权被关押期间,王稼祥自己也还处于困难境地,但他仍然多次安慰伍修权的子女,并给他们以经济上的帮助。

王稼祥在战争中负过重伤,工作中过分操劳,长期身体不好。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与世长辞,终年68岁。伍修权当时还身处囹圄之中,未能参加王稼祥的追悼会,这使他终生感到遗憾。

在王稼祥逝世周年之际,伍修权追思当年,深有感触地说:“稼祥同志与我早年同学,多年战友,更是我一生的师表。愿他的精神与品格长留人间!”

据《党史博览》周平/文

刘禹锡《陋室铭》诞生趣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陋室铭》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他在创作此名篇时,还有一段趣事。

据说,刘禹锡因参与了改革家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而得罪了当朝权贵,被贬至安徽和州县当一名小小的通判。按当时的规定,通判应在县衙里住三间三厢的屋子。可是和州的策知县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看人下菜碟,见刘禹锡是从上面贬下来的软柿子,便多方刁难他。先是安排他在城南门面江而居,刘禹锡不但无怨言,反而很高兴地撰了一联贴于房门:“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

这一举动气坏了策知县,他令衙门的书丞将刘禹锡的住处从县城南

门迁到县城北门,住房由原来的三间减小到一间半。新居位于德胜河边,附近垂柳依依,环境也还舒心。刘禹锡仍不计较,并见景生情,又撰一联贴于门上:“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策知县见刘禹锡仍然悠闲自乐,满不在乎,气得肺都快炸了,又与书丞商量,为刘禹锡在城中寻了一间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半年时间,策知县强迫刘禹锡搬了三次家,面积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

想想这位势利眼的狗官实在欺人太甚,刘禹锡遂愤然提笔,写下一篇超凡脱俗、情趣高雅的《陋室铭》,并请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将其刻上石碑,立在门前,气得那策知县一筹莫展,哑口无言。而刘禹锡的《陋室铭》则流传至今,成了家喻户晓的千古名篇。 据《现代家庭报》冯忠方/文

